

# 救亡与复兴：陈嘉庚爱国实践的双重面向

刘汇川<sup>1,2,3</sup>

(1. 集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2. 集美大学 陈嘉庚与爱国主义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21; 3. 集美大学 陈嘉庚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陈嘉庚致力于民族救亡与复兴的双重面向, 既彼此交织, 又相互衔接, 统一于他的爱国实践, 构成“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的现实基础。陈嘉庚投身民族救亡和复兴的实践, 在逻辑线索上契合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 在方式方法上经历了“复兴-救亡-复兴”的辩证过程, 在依靠力量即主体结构上实现了从个体到群体的历史飞跃, 在相互关系上是一个有机整体。

**[关键词]** 救亡; 复兴; 陈嘉庚

**[中图分类号]** K 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2) 01-0010-06

对陈嘉庚“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的评价, 由毛泽东 1945 年为庆贺陈嘉庚安全时提出, 邓小平 1984 年为《陈嘉庚画册》题字时引用, 习近平 2014 年给集美校友总会回信时重申, 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到走向强起来的各个时期。陈嘉庚为民族救亡和复兴所建立的卓越功勋, 是这一评价的历史依据。笔者认为, 立足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新起点, 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进一步梳理和揭示陈嘉庚爱国实践中救亡与复兴的双重面向, 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评价的历史意义, 同样有利于凸显其对民族复兴的现实价值。

## 一、陈嘉庚爱国实践的救亡面向

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题。资本主义工业化、全球化与积贫积弱、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之间的深刻矛盾, 随着鸦片战争一同爆发, 释放出“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sup>[1]780</sup>。紧接着造成旧的封建社会体系的迅速消亡, “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sup>[1]781</sup>。继之而起的是内忧外患愈演愈烈,

国家民族面临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方位的危机。因此, 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人面对的一个亟待解决而又需要持续推进的系统问题。

陈嘉庚投身民族救亡运动, 改变国家社会的政治旨向是其主线, 这种旨向的变化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反清, 到拥蒋, 直至最终支持中国共产党, 在陈嘉庚先生每一次政治抉择的背后都有着一致而深刻的思想基础”<sup>[2]</sup>。陈嘉庚不断的政治抉择表明他对政治现实保持着持续关注, 而作为其抉择的思想基础则是能够体现“以德治国和民心向背”的传统正统意识。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在唯物史观和人民史观的视角下, 陈嘉庚的正统意识和政治旨向与他所处的社会现实相互影响, 在推动救亡运动的总体进程和具体活动中, 完成了从民族主义者到支持旧民主主义进而赞成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演进。

生长于内忧外患时局之下、深受儒家传统和家乡爱国英雄事迹熏陶的陈嘉庚, 自青少年时代就“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颇具热心”<sup>[3]弁言1</sup>, 后虽身处海外却无时不“热诚内向, 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sup>[3]4</sup>。陈嘉庚早年剪掉发辫、加入同盟会、资助孙中山革命, 是他明确反清立场、公开进行政治活动的起点, 也是他正式开始爱国救亡实践的标志。辛亥革命之后, 陈

**[收稿日期]** 2021-08-19

**[基金项目]** 福建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 (JSZS21003); 陈嘉庚研究院重大研究项目 (JGYJ202006)

**[作者简介]** 刘汇川 (1988—), 男, 河南周口人, 助教, 硕士,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陈嘉庚精神研究。

嘉庚认为“政治清明有望”，基于这一前提，他随即于1912年开始在家乡创办实业、兴办学校<sup>①</sup>。无实业则教育费用无所出，无教育则实业人才无所来，实业与教育是相辅相成的两条具体救亡途径。两相比较，陈嘉庚认为发展实业具有基础性和工具性，而兴办教育更具有目的性和长远性<sup>②</sup>。

身处资本全球扩张的年代，陈嘉庚反而扬弃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逻辑，他把物质财富当作工具而不是目的。出于强烈的天职意识，陈嘉庚“在金钱问题上，处处闪烁着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光辉”<sup>[4]5</sup>。他按照“先有营业而后能服务社会，继而后得领导南侨襄助抗战工作”的思路<sup>[5]37</sup>，围绕民族救亡开展企业活动。把“惟有真骨性方能爱国，惟有真事业方能救国”作为眉头警句写进公司章程，营造充满家国情怀的企业文化。从熟米加工经营到黄梨罐头制造销售，再到进军橡胶业、航运业，并涉足地产、报业、医药、木材、皮革等诸多领域，陈嘉庚通过企业经营奠定了办学的经济基础。

同时，陈嘉庚以“变卖大厦维持厦大”“企业可以收盘，学校不能停办”的决心和毅力，持之以恒兴办新式教育。以厂为校，贯彻“训练职员工人，如师范学校之训练学生”的理念<sup>[3]429</sup>。开办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行业急需的专业教育。践行“为了实现社会发展，需对社会全体成员进行‘全面教育’”的社会教育理念<sup>[6]378</sup>，创办民众夜校，全面规划家乡房屋、道路、医院，改进龙舟运动，改造旧茅厕，兴建图书馆、科学馆，筹建博物院等等<sup>[3]187-188,397-405</sup>。此外，他还在怡和轩、中华总商会等南洋华侨社团实施禁抽大烟、使用公匙公筷等改革措施。更重要的是，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厦门大学等学校也成为孕育进步思想的土壤。学校积极邀请蔡元培、黄炎培、鲁迅等学界名流讲学，公开传阅《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

步书刊，促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罗明、李觉民、罗扬才、郭滴人等一大批先进青年迅速成长，并走上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道路<sup>[7]7-13</sup>。

若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未被外力中断，或若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权能够阻挡外敌入侵，陈嘉庚的实业和教育实践尚有继续发展的空间。然而，以上两个假设条件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都没有可能，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摆脱民族危机、实现国富民强，国内的资产阶级政权日益官僚化、买办化。如此，面对列强尤其是日本的步步紧逼，陈嘉庚开始新的救亡探索。在南洋，他唤醒华侨华人，慷慨捐输南京政府，创办《南洋商报》，号召抵制日货，发起山东惨祸筹賑会筹捐施賑，通电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制裁日本，印发“田中奏折”揭露日本狼子野心，筹款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发起新加坡筹賑会，成立南侨总会，征召南侨机工回国，等等。在国内，他立足民族大义，呼吁团结抗战，助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提案“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等等。

新的救亡实践促成陈嘉庚新的政治展望。1940年，陈嘉庚回国慰劳，“在他周围环绕着的是中国全国性与地方性的政治。他被牵卷入中国的政治漩涡将他的政治嗅觉磨练得更加敏锐”<sup>[5]229</sup>，其中，延安之行是陈嘉庚政治立场蜕变的关键。他实地了解延安街道布局、风土人情、商业经营、政府行为甚至是军事活动的具体情况<sup>[3]157-166</sup>。重庆与延安的强烈反差在他心中形成了鲜明对照——“迨至延安则长衣马褂，唇红旗袍，官吏营业，滥设机关，及酒楼应酬，诸有损无益各项，都绝迹不见”<sup>[3]167</sup>。陈嘉庚“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sup>[8]4</sup>。抗战胜利后，陈嘉庚指出寄希望蒋介石还政于民无异于“谋皮于虎”，发出反独裁、反

① 辛亥革命后，陈嘉庚谦称自己“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绵力，回到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及经营海产罐头蚝厂”。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4。

② 陈嘉庚曾专门论述“实业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强调教育的重要意义，指出“捐资一道，窃谓莫善于教育，复以平昔服膺社会主义，欲为公众服务，亦以办学为宜”。他详细列举自己的办学经历及花费，强调企业“资本实力丧失殆尽”，并非因为教育费用拖累，而是源自资本市场的起伏。办学之志，始终如一，无憾无悔。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439-442。

卖国的号召,要求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并建议毛泽东筹备民主联合政府,支持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

## 二、陈嘉庚爱国实践的复兴面向

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sup>[9]2</sup>。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国民大革命的不断试错和探索,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引,通过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陈嘉庚作为海外华侨的杰出代表,在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与祖国人民休戚与共。

支持中国共产党是陈嘉庚致力于民族复兴的新起点。从陈嘉庚投身爱国实践的历程来看,抗日战争之前他把希望寄托于标榜“三民主义”的蒋介石政府,以教育和实业来改变国家、改造社会。然而,无论是抵御外辱还是内部统治,蒋介石及国民党的表现都让他大失所望,这促使他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旨向。同时,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让陈嘉庚喜出望外,直言“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sup>[3]弁言4</sup>。以此为基础和起点,陈嘉庚进一步思考、追问,“设共产党若握着东南富庶市场,区域广大,不知能如此廉洁,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如延安之精神乎?”<sup>[3]168</sup>这表明陈嘉庚已将思路延伸到未来,希望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成为执政党之后,能够一以贯之地保持为人民造福的精神,带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陈嘉庚的“延安之问”与郭沫若的“赶考之问”、黄炎培的“兴亡周期率”一样,都是爱国人士对民族独立和复兴的珍视与向往,也反映出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和期待。

投身新中国建设是陈嘉庚致力于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嘉庚充满信心,认为“我国地大物博民众,内外恶势力铲除以后,复建国,突飞猛进,转危为安,转弱

为强,转贫为富,指瞬间事”<sup>[8]216</sup>。他推动统一财经和稳定物价、抗美援朝、“一五”计划以及宪法颁布等重大决策的出台和实施,并提出在全国各中学普设科学馆、引致华侨回国投资等7项贴近现实而又富有远见的提案<sup>[10]157-160</sup>。他主张把发展工业和对外贸易结合起来,加强对航海、水产和会计技术人才的培养<sup>[11]15-20</sup>。在他的主持或推动下,鹰厦铁路、高集海堤、杏集海堤等一批基建工程相继立项、完工。1955年,陈嘉庚发表《伟大祖国的伟大建设》一文,坚定地表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幸福。社会主义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sup>[11]138</sup>。1957年,他响应整风运动的号召,从具体的交通、教育事业项目以及行政行为入手,分析官僚主义背后的原因,提出整风运动的建议思路 and 治本之法。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仍然不断思考港口、水库等重要工程,撰写了《厦门的将来》《厦门供水问题》等文章。晚年陈嘉庚全身心投入到祖国建设大潮之中,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奠基鞠躬尽瘁。

促进文化复兴是陈嘉庚致力于民族复兴的重要途径。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上绵延不绝、顽强生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sup>[12]119</sup>。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载体,是民族复兴的深层动力和重要表征。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陈嘉庚认为,民族的延绵和发展,全赖文化之重力,故保留文化,乃能维持民族精神,指出“吾民族赖以维系于不堕者,统一之文化耳”<sup>[8]46</sup>,故“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sup>[13]15</sup>。“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sup>[13]9-10</sup>,文化通过影响人、塑造人而改变世界。陈嘉庚以“诚毅”校训、校园建筑名称等传统文化因素潜移默化影响青年学生,并通过创办集美学校国学专门部、道南、爱同等学校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直到晚年,他仍亲自主持修复并扩大厦门大学 and 集美学村,新建华文补习学校等。陈嘉庚致力于繁荣优秀传统文化的愿望与实践,体现着“一个爱国爱乡的福建赤子对‘吾道南矣’文化意识的历史继

承与时代推进”<sup>①</sup>，也涵养着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

造福海外侨胞、解决台湾问题是陈嘉庚致力于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日本投降之后，南洋一千多万华侨仍“受殖民地政府苛待，被当地民族排斥，损失惨况，不可胜计”，陈嘉庚呼吁政府“派出使领以正常外交手续，予以切实保护”<sup>[11]4</su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嘉庚积极为侨民建言，鼓励新加坡和印尼华侨争取当地合法权益。同时，陈嘉庚继续兴办华文教育，号召华侨在家乡捐建华侨博物馆，回国投资、就业、求学<sup>[11]29-30</sup>。陈嘉庚爱护侨民的态度、团结侨民的做法，对“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仍有很强的现实价值。陈嘉庚晚年一直关注台湾问题的解决，从1950年回国定居到1961年逝世，11年间公开发表相关谈话就有9次之多。他充满感情地提到“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我相信，这个号召很快就会深入到台湾同胞的心坎。800万台湾人民之中有将近600万闽南人，很多是当时追随民族英雄郑成功到台湾去的后代，他们在那里反抗过清朝统治，也抵抗过日本殖民统治者，他们还有不少人是台湾有家，在闽南也有家的”<sup>[11]20</sup>。在陈嘉庚看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同样关系到每一个海峡两岸乡亲的内心情感，这对解决台湾问题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思路。

### 三、陈嘉庚救亡与复兴双重面向的内在逻辑及相互关系

#### （一）在逻辑线索上契合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 展脉络

中国的近代化是一个在不断摸索中前进的历程，其内在逻辑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

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sup>[1]804</sup>。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腐朽衰败的清王朝在这场“决斗”中挣扎了71年，这也是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而奋起反抗、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71年，从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睁眼看世界”、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创办近代企业和新式教育，再到维新派的政治改良、革命派推翻帝制。

陈嘉庚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就处在这样急剧变化的历史进程中。辛亥革命后陈嘉庚早期的爱国实践也正是对这一历史逻辑的反观和应用——在推翻帝制的大前提下，以教育和实业为抓手改造国家社会，培养发展实业的劳动者、社会进步的改革者和开创未来的先行者。其思路 and 效果契合近代中国从发展实业到思想启蒙的逻辑线索。日本侵华加剧，通过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表现的切身观察和深入比较，陈嘉庚重新调整了对挽救民族危亡政治前提的认知，转向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嘉庚根据“一五”期间祖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事实，明确主张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 （二）在方式方法上经历了“复兴－救亡－复兴”的辩证过程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后救亡图存的每次斗争都蕴含着复兴的梦想<sup>②</sup>。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中国人民不断探索民族复兴的具体方式方法。如前所述，陈嘉庚在辛亥革命之后，以教育和实业为救亡与复兴的具体路径。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后，救亡图存便成为最迫切的任务。因此，陈嘉庚的爱国实践全面转向救亡运动。这一方面说明，在推翻封建帝制之后，仅依靠经济层面的发展和制度层面的变化，还不能使中国社会摆脱危机、走上正轨；另一方面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仍然无法真正解决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问题，更承担不起民族复兴的重任，需要更深层次的变革。陈嘉庚继续深入探索

① 见肖仕平，“吾道南矣”文化意识的历史继承和时代转进，载《2014年海峡两岸（集美）龙舟文化节论坛论文集汇编》，2014：52-58。

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

民族复兴的道路,最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向同心同行。

陈嘉庚“延安之行”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直到逝世。期间有令人警醒的“延安之问”,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痛斥和直言,更多的是为祖国发展殚精竭虑和辛苦操劳。他的提醒和“谏言”至今仍有振聋发聩的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与的一系列奠基工作,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工程。同时,陈嘉庚一生兴办的教育事业,不但为民族复兴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同样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保存了独具民族和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资源。此外,出于对海外侨胞和台湾同胞的天然情感及文化认同,陈嘉庚对侨务工作和台湾问题的思考与实践,对于当下中国共产党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构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汇聚海内外民族复兴力量,都是有益的探索和可资借鉴的经验。

### (三) 在依靠力量上实现了从个体到群体的历史飞跃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样态的本质特征之一,而人民立场则是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历史证明,唤醒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是解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的最终答案。“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sup>[9]9</sup>,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结合的产物,其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sup>[9]3</sup>。这种特征感召和凝聚了一批批在民族解放和复兴道路上探索的仁人志士,陈嘉庚就是其中之一。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立场和方法的认同,代表着陈嘉庚心中民族救亡和复兴依靠力量的根本转变。

陈嘉庚经历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期间,他对救亡和复兴主体即依靠力量的认知,也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推进。陈嘉庚早期个人倾资创办实业、兴办教育、支持孙中山革命,随后号召同乡、学生、亲友共同出资出力继续爱国实践,继而在统领南洋华侨支援祖国抗日

战争的过程中逐渐凝聚起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磅礴力量,其主体范围不断扩大。同蒋介石政权的决裂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拥护,标志着陈嘉庚超越资产阶级的狭隘立场,更加科学和紧密地依靠人民群众投身救亡和复兴运动。时至今日,陈嘉庚的爱国情、报国志仍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为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断凝聚起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力量。

### (四) 在相互关系上有机统一于与时俱进的爱国实践

鸦片战争后,文明古国的灿烂历史和农业大国的落后现实之间的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深刻矛盾,让中国社会陷入了整体迷茫和深度思索。随着中国全面卷入资本主义市场,军事较量、经济冲突背后更深层次的政治博弈及文明碰撞愈发凸显。这样的历史境域,决定了中国发展路径探索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也注定了中国的救亡与复兴必须是一个更加紧密的有机整体。救亡不但蕴含复兴的元素,更是复兴的必要前提,复兴则是救亡的自然要求和必然结果。没有救亡作为基础的复兴,梦想就如同空中楼阁,无法落到实处;如果没有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最终实现,救亡的任务很难真正完成,甚至已经取得的救亡成果都有丧失的危险。

近代以来,包括陈嘉庚在内的无数仁人志士的爱国实践探索证明了救亡与复兴的不可分割性。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初心使命的原因之一。作为爱国华侨的杰出代表,家国同构的思维认知是陈嘉庚爱国实践的底层逻辑,救亡与复兴同时并举则彰显出其爱国实践背后的远见卓识。爱国与爱乡,在陈嘉庚的精神中水乳交融,因其紧密,愈益真切;救亡与复兴,在陈嘉庚的实践里顺理成章,因其深邃,更显力量。陈嘉庚致力于救亡与复兴的活动,既彼此交织,又相互衔接,其救亡的具体活动包含于复兴的整体进程之中,二者有机统一于陈嘉庚与时俱进的政治抉择和矢志不渝的爱国实践。

###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2] 肖仕平. 正统意识与陈嘉庚的政治抉择 [J]. 集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2): 11-14.
- [3] 陈嘉庚. 南侨回忆录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 [4] 王毅林. 中华英杰华侨领袖陈嘉庚 [M]. 厦门: 集美印刷厂, 1996.
- [5] 杨进发. 华侨传奇人物: 陈嘉庚 [M]. 李发沉, 译. 厦门: 陈嘉庚纪念馆, 2012.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 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7] 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 民主堡垒 革命摇篮: 集美学校与厦门大学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7-13.
- [8] 陈嘉庚. 陈嘉庚言论集 [M]. 厦门: 中国厦门集美陈嘉庚研究会, 2004.
- [9]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 [10] 陈嘉庚. 新中国观感集 [M]. 厦门: 中国厦门集美陈嘉庚研究会, 2004.
- [11] 朱立文, 编. 陈嘉庚言论新集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 [13] 林斯丰. 集美学校百年校史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 Salvation and Rejuvenation: The Dual Aspects of Tan Kah Kee's Patriotic Practice

LIU Hui-chuan

- (1. School of Marxism,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f Tan Kah-kee and Patriotism,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3. Tan Kah-kee Research Institut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an Kah Kee devoted himself to the dual aspects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rejuvenation, which were intertwined and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and unified in Tan Kah Kee's patriotic practice, forming the base for "the banner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glory of the nation". Tan Kah Kee's practice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rejuvenation has corresponded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since modern times in terms of logical clues, and has experienced the dialectical process of "rejuvenation—salvation—rejuvenation" in terms of methods, and has realized the historical leap from individual to group in terms of strength, and has become an integral whole in terms of interrelation.

**Key words:** salvation; rejuvenation; Tan Kah Kee

(责任编辑 冯庆福)